

反對派妄圖毀壞基本法

□楊堅

反對派為了迫使中央接受其違反全國人大常委會規定的政治主張，竟然不顧他們在2008年9月本屆立法會競選時對選民的承諾和無視投票送他們進入本屆立法會的選民們對他們的授權，開創與《基本法》對立法會的職權規定相抵觸的「辭職」先例。其動機和目的是，撕裂香港社會，在特區與中央之間挖掘政治鴻溝，同時，為反對派打造一支鐵桿反共的隊伍。

民主黨主流派為何反對「5區總辭，變相公投」？對此，民主黨主要領導人的解釋前後不連貫。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曾說，反對「5區總辭」是為了堅持議會長期鬥爭。在他眼裡，社民連和公民黨推行「5區總辭，變相公投」大有孤注一擲的況味。在他心目中，反對派與國家執政黨的鬥爭是長期的，必須有耐心，不放棄在立法會已經佔據的席位，同時等待香港居民再次參與像2003年的「7·1遊行」。他沒有說，假若再次發生類似2003年的「7·1遊行」，民主黨將如何利用，含意卻已在不言之中。

政治矛盾逐步激化

然而，到了2009年12月12日亦即民主黨特別大會表決民主黨是否參加「5區總辭，變相公投」前夕，何俊仁則簡要地表示，反對「5區總辭」是因爲，擔心補選失利，反對派在立法會失去關鍵的三分之一少數即20席而不能否決特區政府關於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議案。早先所謂長期鬥爭、等待時機的皇皇說詞沒有了，只剩下關於席位得失的計較。

民主黨另一名領導人張文光在他報發表文章，闡述民主黨為何反對「5區總辭」，既表示了

不欲與中央關係斷絕的意思，卻又明確表示對於國家執政黨沒有信任，對於國家主體政治制度持反對的立場。

所以，無論根據何俊仁最終僅顧及補選對反對派在立法會席位的得失來考慮，還是依據張文光明白表達的對國家執政黨和國家主體政治制度的對抗的態度來分析，合乎邏輯的推斷是：只要社民連和公民黨啓動了「5區總辭」，使香港政治矛盾進一步激化，屆時，民主黨就不可能袖手旁觀——不僅李柱銘、李永達等民主黨重量級人物或領導人會以個人名義向社民連、公民黨伸出援手，而且，民主黨其他領導人或重量級人物都將會或不得不表示支持，甚至，民主黨將會或不得不調整其地區力量來助陣。政治的客觀邏輯不是任何政治人物的一廂情願所能左右得了的。

到那時，「5區總辭」就將成爲反對派的共同事業，反對派一貫對抗國家執政黨的鬥爭也就出現了「質」的變化。

一再挑戰「一國兩制」

香港回歸祖國以來，尤其2002年下半年特區第二屆政府在董建華先生領導下啓動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以來，反對派一再挑戰《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包括反對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憲制權責對《基本法》若干條款作出解釋並對香港政制發展做決定，但是，沒有溢出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的範疇；而且，在實際上，承認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歷次釋法，也實際接受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這

幾年，社民連儘管採取激進鬥爭策略，也主要是在立法會議事堂扔香蕉、罵罵粗口，或者在遊行集會中施展肢體語言。然而，這一回，「5區總辭，變相公投」性質就不同了，溢出了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的界限，是政治鬥爭方式和性質「升級」。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是特區政治的重要內容，有明確的制度規定。一是立法會及其成員的任期有明確規定，二是立法會及其成員的功能或職權有明確規定，三是立法會個別議員因故提前結束任期（包括辭職）既受立法會及其成員的功能或職權所規限，也受約定俗成所約束。

無視選民對其授權

《基本法》第七十三條明確規定了特區立法會的職權。香港回歸以來，發生過個別立法會議員因涉及刑事案件而無法履行立法會議員職權需要辭職，也發生過個別立法會議員因死亡而不能繼續履行立法會議員職權。在這兩種不與《基本法》對立法會的職權規定相抵觸的情況下，特區政府及時組織了補選，以便立法會充分行使其職權。

但是，這一回，反對派爲了迫使中央接受其違反全國人大常委會規定的政治主張，竟然不顧他們在2008年9月本屆立法會競選時對選民的承諾和無視投票送他們進入本屆立法會的選民們對他們的授權，開創與《基本法》對立法會的職權規定相抵觸的「辭職」先例。其動機和目的是，撕裂香港社會，在特區與中央之間挖掘政治鴻溝，同時，爲反對派打造一支鐵桿反共的隊伍。

需要警惕的是：若反對派「5區總辭」後沒有先例地進行補選，則不啻承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制度可以被用來反對中央。

大聯盟
熱心推動政改

杜可風

抗拒反對派搞風搞雨

絕大多數市民的意願是再不願意看到重蹈2005年政改方案被否決的情況。現在情況已轉變爲只由反對派一小部分人繼續扮演「5區總辭」角色。兩相對比之下，「政制向前走大聯盟」的成立，正好是處於劣勢大去而優勢大長的時機下。「政制向前走大聯盟」首批九十六位以個人身份聯署的發起人，具備了兩點意義：一，突出正氣已成爲香港社會的主流，影響力大。二，隨着政改諮詢進入關鍵的第二個月階段，這股正面力量對於提高市民站到支持政改方案的位置上，所起的將是極大的推動作用。這兩點有利因素，其實源於香港的正氣並不會也不會因爲反對派的搞風搞雨而變質。

「政制向前走大聯盟」成立之後，當然應把重點放在支持政改方案的諮詢方面，把收集更多正面意見作爲主要任務。如何做好這方面的工作且不失重點，面對的是三方面要務：第一，製造聲勢。雖然社會支持政改的力量正在不斷增強，但受到反對派蒙蔽的還有一批人，事實上如果反對派沒有這一批人的支持，也就成不了反對氣氛。因此，只有看到這一要點，才能夠在如何製造聲勢上有所動作，並將製造聲勢視爲與反對派旗鼓相當的行動，才不致自陷是否譁衆取寵的無謂爭議。在看到市民對政改的強烈訴求之下，要收集市民的意見，可行的措施是採取網上簽名、多種講座等形式，透過這些最有效的場合和機會，把大量支持政改的意見和力量集結起來，及時向社會公布，向政府展示。

與民支持政制向前走

第二，如何入手重要且關鍵。利用反對派已經四分五裂的頹勢，並以此作爲反面教材直接讓市民看清反對派的所謂爲香港政制發展好的謊言，是讓其不攻自破的最好機會。因此，「政制向前走大聯盟」不應只從正面道理向市民宣傳，而應結合揭發反對派內訌的種種因素，配合香港不能再重蹈2005年政制發展方案被否決的覆轍作解畫，讓市民在強烈的對比之下，堅定支持「大聯盟」的立場。第三，對年輕一代對真正的普選意義容易被混淆的心態，針對性地舉辦直接面向青少年灌輸政制發展方面知識的講座、遊學活動很有必要。而且從遠遠意義上說，爭取青少年一代支持政改才是穩固香港政制發展的根基。因此，像宣傳「大聯盟」的網上簽名活動，要及早在針對青少年的活動中推行，這樣才能夠達到盡快收集更多的青少年簽名，把年輕一代強烈要求政改的呼聲帶到社會各個層面。

在政制發展這個大議題下，讓各方自由表述很重要，當然，大前提必須是支持政改方案。「大聯盟」已定出一月份舉辦有關講座，邀請官員及學者出席。因此，只要攏到支持「政制向前走，民主步伐不停留」這個主題的學者專家，都可以盡情地發表意見。鄭耀棠已經清晰解釋了成立「大聯盟」的動機：「我嘗試政制向前走，起碼比依家向前發展，唔希望見到政制停滯不前。之前已經試過呢個滋味。」說白了，「大聯盟」就是希望市民積極就政改方案提供意見，讓政府在政改方案中注入更多民主成分。「大聯盟」的只需要支持政制向前走的大原則，對於方案的具體內容則可各自表述意見，正好體現只要認同加入「大聯盟」支持政制向前走，爲普選鋪路就可以了。

針對香港的實際情況，相信鄭耀棠這一招能夠吸納大量的支持政改力量，對於促進政改方案獲得通過有絕對大作用，從「大聯盟」第一批簽名的人都以個人名義出現，已展示了這樣的作用。隨着「大聯盟」宣傳工作的逐步深入，還會有第二批、第三批乃至更多批人簽名支持。簽署人首先必須明白，個人負有在不同界別宣傳支持政改的責任，它除了對推動政改的諮詢工作起着直接作用之外，也可以令市民了解支持政改的重要性，並積極投身到支持行動之中。

議論風生
ON AIR

葡語國家資源豐富

因此至今英語國家勢力最大，法語國家次之，西班牙語國家人數相當，葡語國家不只人丁單薄，財力還不夠。只不過葡萄牙留給殖民地的不是政治經濟，而是文化。世界上說葡語的還有兩億多人，本來不少印尼人能說葡語，但荷蘭人走後，荷蘭語立即被印尼語取代了。不若葡語在巴西、在非洲的五國，甚至在人口不足一百萬的東帝汶，雖然能說葡語的不足人口的一成，但爲了行政方便，官方仍使用葡文。因此葡語國家就算人口不到全球的半成，葡語國家仍然是一個實體。

還有，葡語國家中的巴西，資源豐富，鐵礦產量踞世界之首，糧產也極爲豐富；安哥拉在非洲的石油產量僅次於尼日利亞；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可能有新油源；莫三比克的離岸石油正在試探階段；而東帝汶的石油已開採成功。非洲諸國中還有尚未開採的資源，單就東帝汶，預期未來十七年的石油收益已是目前八年的全國生產

總值。

巴西除外的葡語國家，都經歷過社會主義模式的政治，特別是安哥拉與莫三比克。在東帝汶，由於社會主義政黨奪權，印尼出兵佔領。因此這些國家是資本主義集團的大忌，亦被西方國家特別是被美國所忽略，中國若投資這些國家，購買它們的資源，會如入無人之境。美國在巴西的投資雖然居外國投資的首位，但巴西看透美國的野心，反而感激中國的善意。

單是巴西與安哥拉，版圖面積已超越中國，它們的發展潛能是無從估計的，對中國的作用是超乎經濟利益的。葡語國家所屬的地區經濟組織，包括葡萄牙的歐盟、巴西的南美共同市場，加上非洲五國的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與非洲南部發展共同體，透過葡語國家，可加強連繫。中國作爲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亦可爲這些被忽略的國家申冤，加強作爲第三世界領導的地位，台灣用錢買到人口只有十多萬的聖多美和普林西比的「承認」，中國大陸亦可透過援助奪回外交，還有和這些國家貿易，有互補互惠的功效。中國需要的是能源等資源，而中國可提供的除了服裝與家電等以外，是基建所需的設備與技術，以及開發所需的資金。

從筆者所取得的〇七年資料，進出口總額只有四六三點四億美元，只及中國〇八年進出口貿易總額的百分之一點八，而出口額亦只有一四六點二億美元，是整體的百分之一左右，可說是微乎其微，不成比例的數字。可幸和〇六年比較，出口增加了接近五成，可見有待發展的空間仍大。

澳門的情況又如何呢？自回歸以來，來自葡語國家的入境額雖然增加了一倍六，但出口只增長了一成六，再者進口比出口多了一倍，形成很嚴重的貿易不平衡，出口總值在〇七年只有二十五點四億美元，只及全澳的二成七，變成嚴重的超低比例，這是澳門的工業正逐步萎縮所致。而澳門可以提供的出口，僅限於服裝製品、



「五區公投」。

最終決定與社民連聯手參與「五區公投」，據稱黨主席關信基發揮了重要作用。關信基堅持「總辭補選」就是「公投」：「睇唔要睇全面，唔好太注重手段，唔好太注重『跑馬』，呢個係一個公投嚟嘅！」又一再強調：「今次的請辭最重大的意義在於創造歷史，讓市民可以破天荒參與推動民主運動。」在關信基對「五區公投」推波助瀾的情況下，公民黨終於去馬追隨社民連搞「五區總辭」。

政治偏見扭曲良知

其實，「補選」與「公投」完全是兩回事，公投是投議題，選舉是選人。關信基的學術領域就是政治學，不可能對此沒有基本認識。蔡子強的碩士論文導師正是關信基，而蔡子強12月3日在傳媒發表《公投》，抑或是「補選」，還是「兩難」？就指出：「選舉和公投的一大分別，就是選舉一定有『人』的因素在內，意思是，選民不會純粹按議題來投票，而也會考慮具體候選人的個人素質，看看這些人『投不投得落手』。提倡『公投』的社民連和公民黨，縱使嘴上是硬，但心裡不可能不明白這一點。」作爲蔡子強導師的關信基，其實也是「心裡不可能不明白這一點」。

民主黨元老司徒華、主席何俊仁就反對「五區總辭」，亦認同「總辭補選」就等於「變相公投」。公民黨黨魁余若薇也一度搖擺不定，她曾說：「都要民主派話這是公投才行，但指這是補選，不是公投，變成不是整個民主運動。」

社民連幫主黃毓民最怕有人說「補選」不是「公投」，自稱

「癩狗」的他承認，民主黨否認「五區總辭」等於「公投」，對社民連的打擊十分大，

「話我們這個（補選）不是公投，我們五區請辭嘅道德性就無咗，呢招仲絕過共產黨打擊我們」，「到時就真是梁美芬咁講，我們浪費公帑。」

眼看「補選」不是「公投」的事實，令公民黨對「五區總辭」趙超不前，關信基追隨「癩狗」，聲稱「呢個係一個公投嚟嘅！」終於促成公民黨去馬。令人遺憾的是，被稱爲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四大長老」之一的關信基，卻違反最起碼的政治學常識，是政治偏見扭曲良知，還是有其他原因，這可能只有關信基自己知道。



兩代犯毒世風日下

□白沙



警方在紅磡破獲一個毒窟，拘捕一對「毒母子」。事緣警方先在街頭截查一名「目標男子」，並從其身上搜出毒品，繼而押返其母搜出三公斤K仔，同時揭發這名男子與母親一同製毒。

「毒母子」來自單親家庭，涉嫌利用住所作爲掩護，暗中經營毒品包裝及分銷生意，供應九龍區的娛樂場所。

這起製毒及販毒案件揭示了在利益引誘下，不少人無視法紀製毒販毒，視此爲賺錢捷徑，好逸惡勞。社會對製毒販毒深惡痛絕，毒品害人不淺，人盡皆知。這對母子無視法紀，身爲母親更不惜禱延後代，令人憤慨。

這裡引起兩方面的討論：

其一，雖然單身家庭的壓力較一般正常家庭大，但也不能視之爲可以用不正當手段賺錢的理由。單親家庭本身要積極面對生活壓力，積極尋求發展之餘，社會的支援也不可缺少，好像向政府有關部門申請援助，或者向區議員求助，再憑個人努力，前途一樣光明。

其二，作為單親家庭的長輩，更不應讓子女走上邪路。

很明顯，案中母親不會不知道他們所做的事的嚴重性，也不會不知道事件對兒子的前途究竟有多大危害。知道了還是要走下去，結果自然禍延下一代，害了自己也害了兒子。

一般認爲，撲滅毒品應從源頭加以制止。何謂源頭？有的指是消費毒品最多的娛樂場所，有的指是製毒販毒的行爲。兩者雖然都說得過去，但如果從教育市民對毒品說不的力度入手，應是根本有效的遏止毒品禍害蔓延的主要源頭。

澳門可開拓葡語國家貿易

□黃康顯

自行車與未灌錄的光學媒體，且市場有限；至於進口，則以凍肉、水果、咖啡、及來自葡國的紅酒、電纜、變壓器、礦泉水及橄欖油，是消費品居多，且數量有限。澳門所需要的是遊客與投資，葡國的投資，累計有三點八億美元，只佔整體外資的百分之六。其他國家，就算較富有的巴西，投資額亦極有限。這些窮國人民並沒有能力出國旅遊。

硬件軟件優勢甚多

這樣說澳門豈非一無是處，對中國與葡語國家的關係起不了作用？非也，澳門的基礎建設完善，金融系統穩定，資金流動極高，外匯出入自由，是傳統的自由港、獨立的關稅區。稅制比香港更低、生活指數和經營成本更低；比起內地，市場更加開放，出入更爲自由。因此澳門的經濟可以反應得更快、增長得很多，是跳動式的經濟，很適合靈活式的運作。因此和葡語國家之間，澳門雖無直接貿易的條件，卻有間接貿易配套的硬件，以至配搭的軟件。中國內地目前欠缺的是精通葡語的人才、通往葡語國家的橋樑。澳門其實就是可提供有關商貿服務的平台，澳門如今仍有幾萬精通葡語的土生葡人或澳門人；澳門的行政架構與法律體制源自葡國，和葡語國家大致相同；澳門有許多居民曾移居葡語國家，不少回流以後，自組商會、同鄉會或聯誼會。

目前澳門已做的只包括兩方面：其一是在澳門成立了「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常設秘書處」，自〇三年至今已舉辦過三個論壇；其二は彼此的互訪，前特首何厚鏗訪問過葡萄牙、莫三比克與巴西，而多國元首及部長亦會多次訪問澳門。目前澳門只在葡國設有經濟貿易代表處，將來這類貿易代表處起碼要在巴西與安哥拉設立，並鼓勵所有葡語國家在澳門設立商館、開航線，並安排旅遊、貿易協議、文化交流，都起到互惠互補的作用，亦能配合了中央在「十一五」規劃中向澳門提出「產業適度多元化」的要求。

作者為資深教授，博士